

李敦白: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 曾 毅

“我追求某种理念，中国把这种理念变成了现实。在中国，我对生命有了新的看法。我是美国人，但我是中国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 Sidney Rittenberg，二战后来到中国，在昆明一家开明书店老板的建议下，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敦厚”的“敦”，取了中文名字“李敦白”，并沿用终身。从1945年到1980年，李敦白在中国生活了35年，深度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

对中国共产党心存向往

李敦白于1921年8月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期就嫉恶如仇、追求正义。在大学读书时，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积极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和学术自由。在此期间，他在美共机关报上看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印象。而他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是21岁一次偶然机会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表达！”这首激昂的歌曲在年轻的美国男孩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他与中国的缘分就这样开启。

1942年，李敦白参军，后被派往斯坦福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授课老师中有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培训班的师生绝大多数喜欢中国共产党而不喜欢国民党。李敦白在这里听到了解放区村庄豆选的故事，了解到八路军战士批评军官的民主作风。他还了解到，共产党抗战积极，讲民主，八路军在关心亚洲问题的人里面名声尤其响亮。于是，他对共产党进一步心生好感。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李敦白作为美国陆军新兵抵达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中文专员，负责民事赔偿。此间，一个昆



李敦白

明小姑娘的案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2岁的李木仙被醉酒的美国士兵撞死后，负责赔偿的美军上校居然只给她的家人26美元赔偿费。李敦白非常气愤，替受害者及其家人申辩，但是被军法处驳回。李木仙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人力车夫，他没有再申辩，而把这种灾难当作宿命来接受。李敦白被这种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他当时“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后来，每当他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那些能够改变中国老百姓命运的人，就是李敦白一直好奇而向往的、廉洁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木仙们就是安全的。”于是，两个月后，本该复员回国的李敦白却决定留下来，并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李敦白结识了宋庆龄，并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

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李敦白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天地，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中国，这里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的庄严感让他起敬。在这里，李敦白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1946年5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天李敦白在厕所里巧遇了白鲁德，而白鲁德无意中透露了国民党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这让李敦白大吃一惊。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先念，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让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1946年10月1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敦白终于到达了红色圣地延安。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延安的周末舞会上，李敦白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主席，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朱老总。“在昆明时，有个人跟我讲过许多有关‘朱毛’的英雄故事，他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李敦白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为人随和谦逊，对他礼貌有加，李敦白迅速爱上了这里。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社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斯特朗第二次访问延安时，新华社社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任翻译。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表示：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

这一年，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批准，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中美之间架设桥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直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后，他才于1955年结束了牢狱生涯。出狱后，他没有

任何怨言，一如既往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在广播事业局，李敦白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在这里，李敦白还觅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李敦白读后泪流满面：“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可我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于是他要求组织把自己的工资减半，不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和专车待遇，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学习。这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上，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友人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美国。他说，在踏上中国土地起，他就决心为修建中美关系的桥梁努力一辈子，他确实是这样做的。1981年，他协助美国著名主持人华莱士访问中国，并促成1986年华莱士对邓小平的采访。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叫做“李敦白有限公司”。他的公司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对美国公司收取咨询费；而对中国，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从来不收钱。

2019年，98岁的李敦白走完了他传奇般的一生。回想起自己的中国岁月，李敦白这样说：“我这个前美共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见如故……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腐败的国民党不同，他们在为民众幸福而不是个人私利奋斗……在共产党掌权的地方，我由衷地感到幸福。”



狮子作为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并不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中国文化史上却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同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龙、凤、麒麟等图腾动物一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那么，这种产自异域的猛兽在中国为什么会变成瑞兽，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呢？

从猛兽到瑞兽

狮子是食肉目、猫科大型猛兽，其故乡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被称为“百兽之王”。雌狮和雄狮在体型和外貌上的差别较大。雄狮披着长而蓬松的鬃毛，吼声洪亮，威风凛凛；雌狮体型小于雄狮，头上无鬃毛，吼声较小，这是真实狮子的形象。

狮子在生长繁衍地普遍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热爱，在雕塑和绘画等作品中多有表现。总的来说，主要有两种形象：一种是在自然界中凶猛狮子形象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与表现的真实形象；另一种是把狮子与人和图腾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与表现的虚幻形象。

古埃及既有表现狮子真实形象的作品，又有狮身人面和人身狮面等表现狮子神化形象的作品。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等地，有许多刻画真实狮子的石雕和青铜工艺作品。古印度有以阿育王的狮形石柱头为代表的石雕狮子形象。古希腊虽不是狮子的原产地，但通过与埃及、亚述和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交往，出现了狮身人面像以及人与狮子搏斗画面等为代表的狮子形象。

中国的许多古籍中有狮子的相关记载，但缺乏真实依据。一般认为，狮子是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作为贡品正式踏上中国大地。狮子传入中国后，由于数量有限，普通百姓根本见不到。然而，人们对异域猛兽狮子却投注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

没有见过真实狮子的匠人们，根据书籍中的记载、传闻以及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虎、狗等动物的形态与形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进行理想化、民族化的创作，这样塑造出来的狮子形象和真实的狮子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变成了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祥瑞之兽”。

历代狮子形象的变化

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从文献记载和已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狮子的形象还比较少见，主要以石狮的形式出现。两汉时期的石狮以立式走状为主，只有少数为蹲坐式，运动感较强，一般不分雌雄。从石狮的形体和所放位置来看，其功能主要是用来镇守陵墓，驱魔辟邪。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石狮依旧主要出现在陵墓中，其躯体更大，气势也越来越恢宏，造型上趋向写实，已经分出雌雄；北朝的石狮则深受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大多集中出现在佛教的石窟中，以配角身份蜷卧蹲伏在佛座前面，形成介于西方石狮和汉代传统狮子之间的独特风格。

隋唐时期，尤其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期间，国力强盛，人民富足，丝绸之路繁荣活跃，中外交往日益频繁，西域狮子不断传入中国。在借鉴真实狮子的部分形象，并融合传统狮子造型的基础上，唐代石狮的形象具有清新、活跃、雍容、大气的特色，充满着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和激昂的精神气魄。此外，用狮子作为印染、纺织、陶瓷、金属等工艺品上的装饰逐渐普及开来。五代十国时期，大型陵墓和建筑不再出现，狮子雕塑数量大为减少，出现了以铁制材料为代表的铁狮子形象。我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沧州铁狮”就是五代后周时期的作品。

宋元时期，狮子形象仍以帝王陵墓雕刻为主，石狮的造型大多为方形，追求的效果是装饰性，脖颈上大多佩戴有顶饰。宋元时期的狮子显得较为温顺，在气势上不及唐朝狮子威武，同时作为装饰性题材向建筑领域发展，在官殿、寺塔、宅第、桥梁等，均可见已经走向世俗化的狮子形象。被称为“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桥上，便刻有多尊形态无一雷同的狮子。

明清时期，狮子又恢复了盛唐时期的那种雄迈威武的形象，在许多宫殿、园林、官署、寺庙中，无不列置狮子雕塑。故宫博物院内的六对铜狮子便是这类雕刻艺术的代表。与此同时，伴随着世俗化和商品化的潮流，狮子的形象开始沿着人们喜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宫廷狮子做工精巧、装饰华丽、用材高贵；另一方面，民间狮子充满了生活气息，使用与欣赏并重。此外，还出现了南、北地域上的差别。一般来说，南方狮子细腻华丽、玲珑纤巧；北方狮子古朴雄伟、豪迈剽悍。



从猛兽到文化符号

狮子的社会化历史

□ 章 林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狮子艺术随着鸦片和其他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真实的猛兽狮子造型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与青睐。然而，狮子自从传入我国并被赋予瑞兽的寓意之后，经过千年的传承，已经成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十分受欢迎的艺术形象之一。

狮子形象与中外交流史

狮子传入中国以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狮子文化”，要归功于中外交流。可以说，狮子文化是在广泛吸收和包容了本国各民族文化并借鉴了国外文化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

狮子文化始于汉代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各地的关系之后。南北朝时期是狮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成为中西文化融汇的典范。

隋唐时期，在汉文化 with 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一统，中外交往空前活跃，西域的狮子及其艺术形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狮子形象也传到了异国他邦，中国的狮子文化日趋成熟。

宋元时期，由于经济中心南移，以及航海术、造船业、指南针的发展和应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等地，既是贸易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中国的狮子艺术品与狮子文化随着出口贸易易物品也流传到了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洋诸国。

明清时期，中外交往不断加强，中国狮子的民族化基本定型，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创作手法，并且在民间得到普及。大批到南洋定居的华侨，纷纷在显著的地方设置石狮，以其作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在海外，受中国狮子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日本。而狮子舞更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种舞蹈形式流传至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琉球的狮子文化。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冲绳日语名称的“シーサー（shisa）”便是由琉球方言“狮子”的发音而来。冲绳狮子是从福建传过去的，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最早用于镇风祈福。如今，在冲绳，狮子的形象无处不在，几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可以说，狮子已经成为冲绳人生活的一部分，狮子文化已经成为冲绳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总之，来自异域的狮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后，其形象经过不断演变，成功化作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中外跨文化互动与友好往来的见证。



（上接1版头条）

积极创新工作体系,在发挥行业建设主导作用中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深入推进行风建设”，“坚持教育引导和综合治理并重，立破并举、综合施策，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文联作为党领导的文艺界人民团体、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应在文艺行业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改革、优化职能，把“两个优势”实实在在地体现为行业建设中的

（上接1版二条）福建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万永诚、吴必先、龙腾云领导福建苏区人民肩负起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和继续革命的重任，率领党政军机关和直属红十九团、二十团及地方武装共4000余人，转战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武平、会昌等边境地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最后，福建省党政军机关及直属红十九团、二十团等转战到武平县北部梅子坝等偏僻山区，在大禾乡上湖村遭敌人重兵袭击。万永诚、吴必先、龙腾云率领红军指战员奋勇突围，但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万永诚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龙腾云等绝大部分福建省党政军领导人及直属部队指战员也壮烈牺牲。吴必先在突围中被捕，后押到江西九江英勇就义。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深刻启示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做

（三）

福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将领锻炼成长的摇篮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10位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都曾在福建进行过革命活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锤炼，福建走出了开国上将3名，开国中将9名，开国少将71位。在党的百年历程中，福建涌现出无数为了理想信念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中，有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罗杨才，英勇就义时年仅22岁，他在狱中写的诀别信中讲道：“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

的血迹前进！”铮铮誓言何等坚定、何等豪迈，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勇气概；有闽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林心尧，他被捕惨遭敌人毒刑，被打断了双腿，但依然坚贞不屈；有被称为“红军中的活菩萨”，为长征“提着灯笼走夜路”，在密码本即将落入敌人之手的危急时刻，把密码本一口一口咽下肚子的蔡威，在红军长征中，他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牺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专门看了蔡威的家史，他当时强调：“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福建这片红色圣地，孕育了长征精神、苏区精神、古田会议精神，以及才溪乡调查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厦门精神、晋江精神、

木兰溪治理精神、“马真”精神、闽东精神、三钢精神、谷文昌精神、廖俊波精神等，我们要大力弘扬这些伟大精神，开展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教育，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奋进的力量，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福建是革命老区，老区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把老区建设好、把英烈后代照顾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福建地处改革开放第一线，对台工作最前沿。结合大历史观，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福建省各项工作放在全国发展全局和促进祖国统一大局中来审视分析，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